

新行业“缺兵少将”，技能人才培养不能总是“慢半拍”

本报评论员 郭振纲



断扩大。不过，新基建核心技术人才缺口的问题开始显现，到今年底该行业人才缺口将达417万。来自《北京日报》的消息称，有电竞投资人发出招聘需求近一个月后，一直未找到心仪的人选。

不少新技术企业、新技术岗位“缺兵少将”，必然会制约新技术的发展、新产业的布局。以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为例，根据人社部发布的相关报告测算，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目前存在较大缺口，国内供求比例为1:10，供需比例严重失衡。

进入21世纪以来，高新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，谁掌握高新技术比较早，谁在高新产业方面布局超前，谁就掌握了主动权，否则就容易受到压制。从这个意义上，新兴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，已经成为事关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。

8月31日，多家媒体聚焦了同一个话题：新行业“缺兵少将”。据《经济日报》报道，最近一个时期，以5G、人工智能、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建，成为国家重点投入的发展领域，也带动了相关行业就业规模不

断扩大。不过，新基建核心技术人才缺口的问题开始显现，到今年底该行业人才缺口将达417万。来自《北京日报》的消息称，有电竞投资人发出招聘需求近一个月后，一直未找到心仪的人选。

不少新技术企业、新技术岗位“缺兵少将”，必然会制约新技术的发展、新产业的布局。以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为例，根据人社部发布的相关报告测算，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目前存在较大缺口，国内供求比例为1:10，供需比例严重失衡。

进入21世纪以来，高新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，谁掌握高新技术比较早，谁在高新产业方面布局超前，谁就掌握了主动权，否则就容易受到压制。从这个意义上，新兴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，已经成为事关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。

新行业“缺兵少将”，这事急不得，但也千万慢不得。

去年4月，人社部等联合发布AI工程技术人员、电子竞技员等13个新职业目录。这些新职业目录的公布，为引领新技能养成、改善我国技能人才结构以及适应

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需求，发挥了先导作用。然而，新职业人才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。

新职业、新技能人才的培养落后于产业发展需要，是很多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。

在我国，新兴产业特别是高端产业出现“有职业、无人才”，与不少地方技能人才培养和使用模式有很大关系。

一方面，不少用人单位在人才使用方面长期秉持“拿来主义”，需要人才时，只想着向社会“挖”人才，自己不培养人才，或者很少在人才培养上做投入。一旦人才供需结构失衡，企业高薪挖不到人才的“戏码”就会一再上演。

另一方面，人才培养模式“实用主义”现象比较突出。研究型高校的前沿性研究中，对国家人才结构变化、人才培养预警的研究不足；应用型高校或者职业技术学院在人才培养上，偏重市场导向，重视当下、轻视长远，容易导致既有产业、行业所需的人才培养富余，而新兴产业、新技能的人才培养短缺；有关部门对新兴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布局滞后于新技术、新产业的发

展速度，调整专业目录和人才培养结构的进度和力度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。眼下，在国家新职业目录的影响下，一些高校积极谋划设置新专业，一些职业技术学院迅速调整新技能人才的培养。但毕竟人才培养需要时间，在短时期内，新技能人才难免会供不应求。

尽管有种种现实的困境，无论如何，培养新行业新技能人才，这事千万慢不得。

面对新技术、新产业的迅猛发展，应对新技能人才短缺带来的挑战，主管部门、高校、企业等相关部门都要有紧迫感，要形成合力，共同破局。从近期看，人工智能代表了未来一段时间高新产业的发展方向，伴随着高新产业的不断发展，对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旺盛，无论是国家有关部门，还是人才培养机构，都应该对此高度重视，加速调整人才培养结构，加大人才培养力度；从远期看，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进，智能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清晰，在顶层设计层面，对新兴行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，应该及早布局、及早谋划、及早行动，而不能总是“慢半拍”。



赵剑影

上午9点，碧空如洗，位于北京大兴区的北京首兴永安供热有限公司厂区，阳光照耀下，一排排砖红色建筑和地砖墙。

“现在，我们这些烧锅炉的也敢穿白色衣服了。”一位工作人员说道。循声过去，果不其然，所有工作人员都穿着织有公司logo的白衬衫。

记者们七嘴八舌开始发问：“之前你们穿什么？”“就今天穿了白衬衫，还是平时上班都穿？”

“之前常穿黑色，至少是深色。现在白衬衫是我们的工服，上班就穿。”

“蓝天数多了”是近几年北京市民的普遍感觉，因为习以为常，“北京蓝”在朋友圈刷屏的情况也变少了。近几年，北京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中，统筹本地治污与区域协作，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特别是打赢蓝天保卫战，四项主要污染物年均浓度明显下降，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。

“北京变了，京味儿浓了。”在北京采访，听到最多的就是这句话。

让市民幸福感明显增强的，不仅是空气质量改善，还有人居环境、社区服务、生态环境等配套设施的改善。

北京早已步入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行列，城市建设的高度与速度令人艳羡。然而，城市在生长，问题也会不时出现。与“国际一流”“和谐宜居”对标时，“雾霾灰”“行车难”“背街小巷”等细微处，可能就会拉低分数。这影响着首都的形象，也关系着人们的获得感。

管理城市与建设城市同等重要。一座城市的现代化，不止表现在经济数据、高楼大厦、车水马龙，更在于运转效能与公共服务的细节。

一座城市的文明与品位，取决于社会治理能力的高度。打理好大国首都，需要理念之变。大城之治，在于管好一件件“民生小事”。

立治有体，施治有序。从“管理”向“治理”摸索、实践，北京聚焦群众的操心事、烦心事、揪心事，用“绣花”功夫奔小康，在京华大地上谋篇布局——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契机，以科技创新为驱动，以“街乡吹哨部门报到”“接诉即办”机制为抓手，撬动基层治理大变革，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。

保护中轴线文化遗产、治理背街小巷、打造南城三年行动计划、建设通州城市副中心……北京立足城市整体规划，朝着新时代北京城市发展方向，打出一系列组合拳。

与此同时，胡同整治、棚户区改造、留白增绿、缓解交通拥堵、治理大气污染、“腾笼换鸟”发展绿色经济……治理到哪里，提升就跟到哪里，关注居民现实生活所需，建立结合、增减并举，让生活其中的人们享受到便利舒心。

“开墙打洞”封上了，游商散摊清理了，地下群租房整治了，便民综合体、养老服务照料中心、社区健身场馆、“口袋公园”建起来了。

行走在如今的北京城，风貌更易，京味独具，这是古都之变、城市之治的缩影。

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北京的城市治理中，市民不再是单向的“被管理者”，还成为参与治理的“主人翁”。城市管理更精细，市民参与治理更积极，家门口的问题，共治共管、共建共享。老街风貌修复，居民和规划专家共同讨论；老楼加装电梯，小区代表挨家挨户听取意见、敲定方案……城市治理没有旁观者，每位市民都是参与者。

“城，所以盛民也。”城市的变化，支撑和重塑着京城百姓的生活。以“治理红利”取代“规模红利”。随着治理者的“绣花”针脚越织越密，北京的城市运行也越来越稳。

药店“连而不锁”，隐患多多

罗志华

据8月31日新华网报道，陕西省药监局近日约谈了违反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》的11家零售连锁企业法人及质量负责人。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对零售连锁企业“连而不锁”突出问题及存在的风险隐患进行了分析，并提出整改要求。

连锁药店“连而不锁”，简单理解就是本应属于某医药连锁公司的药店，实质上却与之不相干——拉大旗作虎皮。从小药店的角度来看，仅凭自己的实力，很难树立品牌并赢得百姓青睐，傍上医药连锁公司既可扩大知名度，也便于获得医保定点资格。对医药连锁公司而言，有药店将加盟费送上门来，还不必为其经营管理操心，稳赚不赔。

问题是，假的连锁药店，其进药渠道与药品定价等不在医药连锁公司的掌控范围，却给监管部门造成了连锁药店统一管理的假象，可能因此暗藏二手机药品回收、雇用“影子药师”、违规销售处方药、套取医保基金等现象，危害不容小视。

2016年，商务部印发的《全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规划（2016—2020年）》明确，到2020年药品零售连锁率达50%以上。此规划是为了发挥连锁药店集群效应，便于提升连锁药店的内部监督能力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2020年或许也将是小药店发展的一道坎儿——若不走连锁的路，就可能渐失市场空间。今后一段时间，“连而不锁”的情况或许会有所增加。

以前瞻的眼光看，更需防范的是药店“连而不锁”破坏医改大局。近期，医保个人账户改革受到社会广泛关注，这项改革给民众带来红利的同时，也对监督形成了挑战。“门诊开药报销”将给小药店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，但从医院开药倒手卖给药店，或许可以获得差价带来的利润，这对小药店收购二手药形成了不小的利益诱惑。对类似潜在问题，相关部门应提前筑牢防范堤坝。

老百姓因信任医药连锁公司而选择其开在家门口、小区外的门店，但“连而不锁”的背景下，人们进入的很可能是冒牌、傍名牌的药店。这种移花接木、欺骗消费者的花招，必须引起重视，想办法解决。

个人破产制让“诚而不幸”的人再次出发

子渝

据中新网报道，近日，广东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《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》。条例规定，在深居住且参加深圳社保连续满三年的人，因生产经营、生活消费导致丧失清偿债务能力或者资不抵债的，可依法破产清算、重整或者和解。

作为我国首部个人破产法规，前述条例引发热议。不少人会担心，如果个人像企业法人那样，在身背重债的情况下，只承担有限责任，是不是就可以欠债不还了？个人破产制度的出台是不是会帮助老赖作恶？

首先应该明确，不同于企业法人破产制度，个人破产制度强调的是救济意义，“诚实”和“不幸”是相关立法的关键词，即法律希望通过破产这一方式合理调整债务人、债权人

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义务关系，给不幸陷入债务危机的人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，为他们重振旗鼓提供制度性保障。也即，个人破产有着严格的标准，只有遭遇债务危机的诚实且不幸的人，才有可能启动此程序，而老赖，即失信被执行人，是指那些明明有钱却故意不还的不诚信债务人。缺少相应的前置条件，个人破产程序便无法启动。

同时，“免责考察期”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滥用相关权利及恶意逃债的出现。根据上述条例规定，三年的免责考察期满，破产人才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免除剩余债务。而在破产考察期间内，债务人应当定期向相关部门如实报告个人收入、开支、财产等状况。同时，债务人的消费行为会被“比照”失信被执行人限制消费的相关规定，受到一定的约束。比如消费限制，债务人子女不能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，搭乘飞机和高铁只能选

择经济舱和二等座；从业禁止，债务人不得担任相关企业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职务，不得从事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从事的职业等。

此前，由于个人破产制度的缺位，个体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往往不足，一旦出现变故，就须承担无限的债务责任，而无法像企业法人一样拥有市场退出机制。个人破产条例相当于给了他们重新开始的机会，尤其是因疫情导致经济不景气而债务恶化的个体市场主体，个人破产制度一定程度上为其再次创新创业解除了后顾之忧。

当然，个人破产制度不会一蹴而就，相关条例目前仍在探索阶段。比如，企业法人破产制度与企业实际掌控人的个人破产如何作好衔接，免责考察期内恶意逃避法律制裁的惩戒措施如何细化，等等。任何新制度都有一个发展完善、探讨修正的过程，不妨多给其一些时间和空间。

应的法规规范，户外极限运动的行业、产业发展极有可能陷入混乱状态，让更多人面临安全隐患。

进而而言之，如果没有相应的规范约束和保障，户外极限运动在未来发展中恐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，而整个社会也可能为此耗费更多资源。近些年，每次户外极限运动险情发生后，政府和有关组织为实施救援而动用的社会资源难以估量，这已经引起了公众的广泛讨论，也出现了一些被救援者事后被索赔的案件，这些都提示我们，对户外极限运动者的救援不是无限的，涉事个人也应为自己的不理智埋单。从这个角度上说，也有必要及早在这方面划出红线，倒逼相关行业和人员最大限度地把安全放在首位，对自己负责，同时节约社会资源。

“法者，治之端也。”我们期待尽早制定涉及户外极限运动的规范和制度，逐步建立起具有领先水平的户外极限运动治理机制，在系牢“安全绳”的同时，促进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。

给极限运动系牢“安全绳”

训机构。相关统计数据显示，从2010年到2019年，我国极限运动相关企业注册总量，由8000家增长至近3万家，仅2019年新注册的相关企业就有4200家，户外极限运动正成为资本追逐的热点产业。

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，户外极限运动造成的伤亡事故时有发生。比如，2017年，“中国高空极限运动第一人”吴永宁在一次极限挑战中失手坠亡；不久前，一名女翼装飞行爱好者在张家界天门山不幸遇难。

这些悲剧既与爱好者缺乏专业技能储备、对安全风险不够重视有关，同时又与法律的刚性约束不足也有关。与一些传统的

体育项目相比，户外极限运动不仅追求“更高、更快、更强”，而且强调和追求参与者在突破身心极限后获得的愉悦感和成就感，对专业技能的要求更高，参与者必须经过长期的专业技能培训，才能确保人身安全无虞。

遗憾的是，因相关市场规范的缺失，不少没有资质、没有专业领队、没有完备应急预案的“三无”户外极限运动俱乐部，为分得市场份额的一杯羹，纷纷以“速成”的形式开展所谓的专业培训，甚至不给参与者购买相关保险，这无异于给相关参与者埋下了人身安全的隐患。

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不提早谋划与之相适